

见证日本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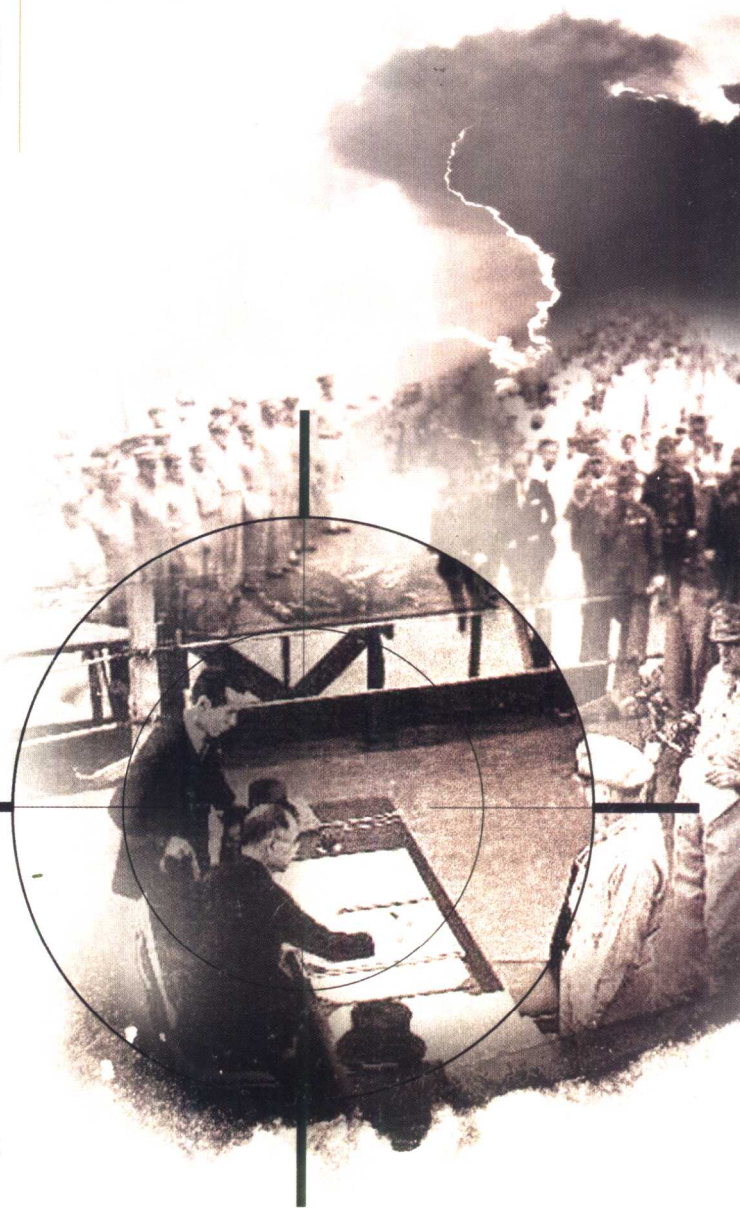
Witness the Surrender of Japan

历史一刻

亲历
盟军对日受降仪式的

唯一
健在的中国记者

黎秀石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见证日本投降

亲历
盟军对日受降仪式的

唯一
健在的中国记者

黎秀石
著



历史一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见证日本投降/黎秀石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 8

ISBN 7 - 218 - 05004 - 2

I. 见… II. 黎… III. 日本投降(1945) - 史料 IV.
K265. 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91613号

选题策划	黄尚立 陈锐军
责任编辑	倪腊松 崔肇钰
装帧设计	卢小雅 + 何筠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5
插 页	10
字 数	166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 册
书 号	ISBN 7 - 218 - 05004 - 2/K · 987
定 价	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

出版社(电话: 020 - 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 83791084 020 - 83794727)

懲前毖後

本報特派員黎秀石寄自東京

侵略的日本屈膝了，我們盟國已獲得了最後勝利。但盟國反侵略的工作尚未完成，今天正隨新盟軍統帥進駐東京而步入最重要時期。這時期的工作是當前最急。對日本作，我們的工作是要把這侵略戰爭，從日本對

侵略日本期間，不問登前毖後，徹底消滅其軍義。我們要懲前毖後，首須懲是，盟國應是日本的侵略戰爭？

◎軍部

日本的侵略戰爭，日本，在軍人，是盟國人

軍部把持日本，執他們可政事，復舊恐怖事件，則當固他們的地位。日本民衆受軍部煽惑，改選議會仰其恩惠，政內閣要他們的支援。數十年來，軍部就是這樣直接間接的統治全國，執行

對軍人的故技，潛代民間，伺機而起。記者昨與日人加起舊黨男討論此事，他不否認日本軍人有這種陰謀，但預測他們不能再煽惑日本民衆，因為他們打敗了仗，「已無發言權」。

加緊的預測可能實現。盟軍者的觀察，日本一般民衆不滿意日本打敗仗，他們只盼望日本「科學的救世」。在他們看來，日本對百萬，歸政將

對於日本的政一句批評的話階級。於此亦頗滿意，他模地嫌「獨行民主政治，他們意以為那憲法可以產生還是令人啼日本商談」。伊藤克岡一般日本人民，他必大刀日本政制中軍人



黎秀石近照

這一次真
完成，這
時歡歡
光，這
居的

碼頭，現在似乎可以從中
國人的角度去觀察與變化
的印光所形成的了。日本
駐加於四月二十四日開始
會報，金印光氏與

風和海洋以後，印光已經
找不是一個日本字了。印
光，這日本字在維多
利亞時代的歷史

仰光解放
本報特派員的印象

1946年5月11日

印度洋上

本報特派員黎秀石



92岁的黎秀石与91岁的妻子汪克柔
2005年7月于家中



汪克柔1946年于印度
加尔各答



黎秀石妻子儿女，1948年摄
于英国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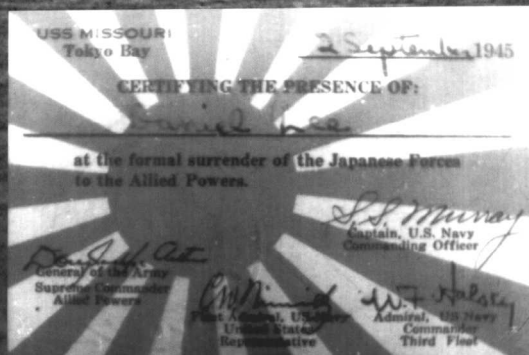


抗日战争期间来华援助的保
加利亚医生甘杨道（左一）
1978年与其夫人张荪芬（右
二）来中山大学与黎秀石夫
妇相聚

1945

agreement
ivity
Haley

J.M. Dunnington
Charles A. Lockwood
R. A. H. H. H.



盟军发给黎秀石登上密苏里号采访对日受降仪式的邀请证



黎秀石1914年生于广东南海西樵



1945年8月黎秀石(左二)
在东京与外国同业交换在日本所见所闻



1944年在缅甸战场与
英国14军军官合影



1945年7月黎秀石(前排中) 与
进击日本本土的英国太平洋
舰队的飞行员合影于航空母
舰甲板上

1946年5月中国海军参
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
二周年伦敦大游行
(黎秀石摄)



1946年巴黎和会期间
黎秀石(左一) 和中央
社记者及外国记者合影





1931年9月黎秀石（左一）与燕京大学同学套上“誓雪国耻”的袖章，抗议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



燕京同学慰劳义勇军（右一为黎秀石），摄于1933年



热河开鲁城的义勇军（1933年初）

We, Major General Donald Gledhill and Vice Admiral Ruitaro Fujita, in virtue of the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to the Allied Powers of all Japanese Armed Forces and all forces under Japanese control wherever situated, as proclaimed in Article Two of the Instrument of Surrender signed in Tokyo Bay on 2nd September, 1945, on behalf of the Emperor of Japan and the Japanese Imperial Headquarters, do hereby unconditionally surrender ourselves and all forces under our control to Rear Admiral Cecil Halliday Japan Marcourt, C.B., C.B.E., and do hereby carry out all such instructions as may be given to us or under his authority, and to issue all necessary orders for the purpose of giving effect to all his instructions.

Given under our hands this 16th day of September, 1945, at Government House, Hong Kong.

In the presence of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On behalf of the Commander-in-Chief, China Theatre.

陸軍少將
岡田梅吉

海軍中將
藤田類太郎

以下图片由香港历史档案馆提供



日本海軍中將藤田類太郎簽署投降文件,攝于1945年8月

在香港簽署的日本投降書,日期是1945年9月16日



兩架94型日本裝甲車在港島街道上(可能是英皇道)行駛,街道上还有不少日軍,圖左上角的四支煙囪應是北角發電站,攝于1941年12月后



从赤柱集中营救出的印度籍战俘,摄于194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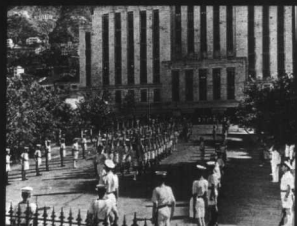


在日军投降前,携着地雷位置图离开香港的日本军官,摄于1945年

英国陆军及海军
人员于日军投降
后到达香港。摄
于1945年



在投降仪式中担
任仪仗队的英国
太平洋舰队成员
在皇后像广场步
操。摄于1945年



被英国皇家海军
遣走的日军。摄
于1945年



英国海军少将夏悫准备宣布英国
海军舰队到达香港。摄于1945年
8月29日



日军投降后，英国海军及陆军人员拘禁在
香港的日军。摄于1945年



香港在1946年3月审讯战犯，共有129名
日本战犯被审讯，当中21名被判死刑，
包括集中营高级管理员德永，及集中营
医官齐藤

自 序 1

还历史本来的面目

到今年9月，日本向我国和美、苏、英等盟国投降60周年了。可是时到今日，竟有人要篡改历史，企图否认日本的侵略罪行。

我作为当年的一个战地记者和见证日本军政代表在美舰“密苏里”号上签降的仪式，有十分严肃的责任揭露篡改历史的阴谋。

照片最能见证历史事实。当年重庆《大公报》用粗土纸印行，不能登照片，我只能靠文字报道，但我也拍了些照片，为历史作证。其中最重要的一张是拍摄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大本营，二人恭立在我国政府的代表徐永昌上将签字受降的桌子前，他们后面正步站着三个日本海军军官、三个日本陆军军官、三个日本文官。徐上将左侧站着一行盟国代表。照片的背景是美舰上的16吋大炮和日本海，一平如镜。

我离日经香港回国时，把这两张底片之一，送给皇后大道中一照相馆，他们把它放大为10吋，摆在门前，港人第一次看见日本投降真相，无不拍手称庆。回到重庆，《大公报》总编王芸生先生告诉我，徐永昌说，他看过许多记

者在“密苏里”舰上拍的照片，但没有一张比得上黎某拍他签字受降的那张，让我送他一张为念。

当时国内正在改朝换代的动荡中，鲜有重视徐永昌的受降照片，我也无意把它放大供人同庆。

到了“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把我许多相片和底片都抄走了。那张甚有历史价值的底片，就不知去向了。

我在此一提，无非是希望在香港或台湾，有知情者提供线索，找回那另张底片或放大的相片，补充空白。

全球有许多著作和照片记载日本的降服，当时见证的记者，今天还活着的恐怕不会只有我一人，但是当时中国在日的同业只有我一人幸存至今。所以我有责任尽我所能揭发颠倒历史的罪行。

宝贵的历史照片之外，有文字可补缺。我在东京报道日本投降的文字有几十条，都是根据本人十多天在日所见所闻，用电报和航寄，在重庆《大公报》发表，成为当时读者了解日本投降的重要资料，现在本书摘要照原文登载，以所提供的事实，揭发篡改历史者的罪恶。

本书还登载日本向中国和盟国最高统帅呈递降书原文，以斥责篡改历史者的谎言。

我自幼痛恨日本侵略我国，但离日前还写了一篇通讯，题为《20年后》，以寄托我对中日今后能化敌为友的希望。但事与愿违，在其后的半个世纪，日本军国主义逐渐死灰复燃。我为中日前途担忧。

近几年，人老了，看得远一点，预见今后中日有和睦相处的可能，因此在本书附上拙作，请读者指正。

《南华早报》广州版的一位负责人刘女士看了拙作后，叹了一口气说：“很难！”我同意她的感觉。中日双方很多人也会有同感。在我国，深仇大恨太沉重了。在日本，把我看作劣等民族可取而代之的旧思想根深蒂固，挥之不去。但我认为人的思想和感情总要变化，不为旧时代所局限，2005年7月10日《广州日报》在沉痛纪念南京大屠杀的版面上，突出八个大字：承载悲愤，祈愿和平。这正好表达全国许多同胞的心声和日本有识之士的企望。

真的“很难！”时代的送旧迎新是艰难的。国父孙中山当年奔走四方，要打倒帝制建立民国，也是十分困难的。但他成功了。我们后辈，应以他的大仁大勇为榜样。

中日间矛盾重重，这是肯定的。但矛盾是可以解决的。没有矛盾是死寂的沉闷。有矛盾才能产生新生力量，推动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进步。

当然，送旧比迎新有时更困难。但生命之轮规定人老是要死的，新生的却川流不息。所以新思想、新感情必从新时代来临，或早或晚，但终必送旧迎新，由不得旧意志、旧观念而转移。因此，我对中日关系，从长远计是乐观的。

企图篡改事物真相的人，只能改写无知者的历史教科书，决不能歪曲已发生的事实。他们自欺，不能欺人。愿这本小册子可为见证之一，传到后代，永无穷尽。

黎秀石

2005年7月于中山大学蒲园

自序 2

我是一个普通的报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在英国采访，遇见这样的一件社会新闻。家在普利茅斯港的卜乐夫人把一岁的儿子巴里交给女友康斯·德露带着，自己提了菜筐子买菜去了。19岁的康斯把小巴里带到离普港300里外的鲁森镇，在一家中国饭馆吃了一顿炒饭后，便把小巴里留在饭馆自己溜走了。可怜的小巴里说不出自己的姓名和家在何处，饭馆老板把他交给警察局。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却没有人来鲁森认领他。警方只得把他交给公立的托儿所教养。26岁的母亲那天买菜回来，女友和儿子都不见了，遍走邻居不获。普港警局在所属地区搜查三年，毫无结果。

鲁森有一对不育夫妇，姓伯勒，在托儿所看见这个可爱的小孤儿，于1948年办好一切合法手续收养了他，起名叫提摩太·伯勒。就在这个时候康斯出现了，她告诉卜乐夫人自己当年荒唐的行为。两地警局查究，发现提摩太·伯勒就是失踪的巴里·卜乐。卜乐夫人以为可以领回儿子了，没有想到，一场惊喜到头来是空悲切。原来英国法律规定，凡办妥收养手续的孩子，不能改变其作为养子的法律地位，因此巴里·卜乐不复存在。他的亲娘无奈，只有含泪请求伯勒夫人让她见儿子一面。养母答应了，但

有一条件：见面时亲娘对儿子不得表示亲切感，也不可喊他原来的名字。

卜乐夫人回家病倒床上。她认为法律不公平，因为她没有遗弃巴里，并且当天就请警局寻人。她接到不少不相识的人来信安慰她。不少报刊也评论此事，有指责警方寻人不力，亦有责问康斯为什么不早把事情告诉卜乐夫人，也有告诫父母带好幼年孩子，却没有慈善团体或妇女会提出卜乐夫人是法律下的受害者。我当时对英国人就此事的上述反应都表示赞许，人云亦云。

几十年后我写自述时，细想我年青时的思路，突然自问，信仰基督教的英国人，为什么没有一个教会或信徒提出以“爱人如己”的教义来解决卜乐夫人的痛苦呢？养母难道不能主动地把巴里交还给他的亲娘吗？更重要的问题是：我当年也是个基督徒，为什么我也人云亦云呢？可见我实在是个思虑不足的普通人。

1945年9月2日，日本向盟国投降，在东京湾美舰“密苏里”号上举行。美国陆军大将麦克阿瑟垄断盟国受降仪式。各国代表，除英美外，均以为应根据1943年11月中美英举行的开罗会议的明确宣告，三国对日作战“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但是美英违背三国的共同声明，暗地里答应日本的要求，接受日本有条件的投降，保留日本的“天皇”，保留其国体。

美英欺骗中国和其他盟国，在日本投降书原稿上删去“无条件投降”一语。当时麦克阿瑟没有把日本降书的复原本发给观礼的记者，所以我们被蒙在鼓里，只听见麦克阿

瑟宣读受降书说：“本代表兹命令日本帝国大本营应立即对不论在任何位置之一切日本国军队及在日本国支配下之一切军队之指挥官，命其本身及在其支配下之一切军队应立即无条件投降。”

国家投降与军队投降是两码事。德国降书就写明德国无条件向盟国投降的。前者的影响很深远，例如，可决定是铲除“天皇”还是保持其王位。

那天，我作为记者，只管庆祝胜利，而不识破美英的阴谋。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个洞察力不高的普通人。

我离日回到重庆，有人问我在日采访时为什么不去看看广岛或长崎？我告诉他，我出国前，主编王芸生先生建议我，对国内外大事，要先了解报馆的态度才好对外国同业发表自己的意见。广岛被炸、苏联出兵东三省，这两件大事发生时，我身在日本，不了解报馆的意向，所以我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去广岛了。况且当时东京情况千变万化，我离不开。话虽如此，我心中另有想法：要保命。听说进入被原子弹炸毁的地方的人，会染上白血病！

我是个不愿冒险的普通人。

我祖父和外祖父都比我强。两位都是漂洋过海到美国当华工。一位学会了照相，回广州开当地第一家照相馆，并在家乡南海县丹灶乡（现丹灶县）盖房子办启蒙小学名叫醒华。外祖父在美国什么坏事都曾干过，后来一改前非，信了耶稣，当上牧师回广东各地传道，生活艰苦。

我父亲是香港大学创办初期的西医毕业生，我母亲也是西医出身。后来因家父炒外汇破了产，家道中落。我母